

西北行记丛萃

辛卯
侍行记



陶保廉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22.83
T293
0038679

辛卯



侍行记

陶保廉著

刘满点校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考古所图书馆



2003867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辛卯侍行记/(清)陶保廉著; 刘满点校. —兰州：
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00
(西北行记丛萃/胡大浚主编)
ISBN 7 - 226 - 02355 - 5

I . 辛… II . ①陶… ②刘… III . 游记 - 中国
IV 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3657 号

责任编辑：李树军
封面设计：徐晋林

西北行记丛萃
辛卯侍行记
刘满 点校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)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2 字数 325 千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000
ISBN 7 - 226 - 02355 - 5/K·397 定价：19.80 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2002.4.1

考古书店

编者的话

西北行记，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、考察、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。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军事、民风习俗、道路交通、山川景色、气候物产等等内容，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。由于它是私家之作，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，更具真实性；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，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，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，即兴秉笔，形式自由，文字往往生动活泼，更具可读性。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、文学间的一大创造，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！

现存的西行记，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《佛国记》及北魏宋云的《行记》，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。唐代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。唐、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，大多已残缺不全。元、明以降，这类作品逐渐增多。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，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，见于载籍的不下数百种，其记载愈加详尽，内容

【一】
·编者的话·

愈加广泛。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，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，但多集中在元、明以前之作，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；清以下的大量作品，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，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。在今天开发西北、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，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，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。不仅如此，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，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，有选择地推介、普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中，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，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，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……增长知识，陶冶性灵，继承前人开发利用西北的不懈努力，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。

《西北行记丛萃》便是基于以上考虑，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、汇录而成的。丛书第一辑选录 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 25 种，辑为 10 册。其内容涉及 200 年来西北地区（甘、宁、青、新、陕）道路交通、城乡风光、民情习俗、气候物产，以至政治变迁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。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，提供一个从不同的、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，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。

本套丛书，以记叙详实、通俗生动、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，兼顾内容的多样性。范围涉及甘肃、新疆、宁夏、青海和陕西。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，进出西北以前、以后的文字，概予保留。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，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，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；对原版本中文字、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；无标点者加标点，未分段者予以分段；凡征引前代典籍、诗文之处，均予查对校核。

全书不出校勘记，文中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

【二】

· 西北行记丛萃 ·

属者，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；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，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；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，酌加方括号作简注。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，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，以为区别。本着尊重历史、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，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，一般不予更动。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，但限于多种原因，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，恳请专家、读者指正。

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，助您走近西北、了解西北，激发您对这片辽阔、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的热情与兴趣。

编者

2001年5月

前

言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《辛卯侍行记》(以下简称《侍行记》)写于光绪辛卯年(1891年),到2001年刚好是一百一十年。

作者陶保廉(1862—1938),字拙存,秀水(今浙江嘉兴市)人。关于陶氏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,费省先生著有专文《陶保廉》(《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》第三卷《陶保廉》,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)。关于他的生平,这里仅补充两点:陶氏为清末民初名人,他与陈三立、谭嗣同、吴彦复被时人称为“四公子”;曾任《清史稿》一书的纂修。其父陶模,《清史稿》有传,曾历任甘肃文县知县、皋兰知县、秦州知州、甘州知府、新疆迪化州知州,历署兰州府、兰州道、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、巡抚、甘肃新疆巡抚、陕甘总督。青年时代的保廉,一直随在西北任职的父亲生活。可以说他生于浙江,长于西北,熟悉西北情况,对西北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1891年,其父陶模调任新疆巡抚,陶氏随父亲进京述职,由西安经河南、山东到天津,又由天津经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到新疆迪化(今乌鲁木齐)赴任。其间历时数月,行经今九个省市,行程共一万一千余里。这一年是辛卯年,《侍行记》就是长

途旅行的日记，故名。与《侍行记》相类似的日记体的著作，在清代是比较多多的，仅涉及我国西北地区的名著就有洪亮吉的《伊犁日记》、祁韵士的《万里行程记》、林则徐的《荷戈记程》等。但是这些著述失之简略，大都是“随手疏记”，“略加编缀，遂尔成篇”。陶氏则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写作。在由陕西赴新疆途中，他带的书籍就装了五车，而且沿途一路仔细观察，认真记录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即使在冰天雪地的西北，也是如此。他在十一月初五日记道：“余所坐车，席棚毡亘，羊皮门帘，左右缝两袋，盛笔墨、罗经、图书，常将车帘挂起，以便左右望。今日大风砭肌，呼吸间寒气入鼻如刺，不得不垂帘两旁。……身披重裘，足著棉袜，又屈皮褥三分之一以盖两腿，仍欲冻僵。”他在行记中记载了各地的山川、村镇、道路、驿站、津梁、关隘、堤堰、城池，也记载了沿途所见的古迹、寺观、陵墓、祠庙、风俗、学校、民族、人口和历史人物。对所经过的州县和历史名城，追溯潮流，一一叙其沿革。而且对于沿途历史地理方面的疑难问题，他都旁征博引加以考证，有的考证长达数千字。对沿途的所见所闻，他都淡古论今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凡此种种，都是《侍行记》前后的同类著作无法相比的。书成之后，作者又作了几年的润色加工，即使在1897年刊印之后，作者还在继续修改订补。《侍行记》不仅所记内容广泛，而且翔实可信，因此《侍行记》是清代这类著作中晚出的一种，也是最好的一种。

在《侍行记》中，作者将全书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，即途径的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数省，即使是作者没有经过的青海省，也费了不少笔墨。在一万多里的行程中，今东部五省市的行程是五千多里，占路程的一半，但所记的内容不到全书的两卷，而西北四个省的记述却占了书的四卷多。作者对西北几省的人口、民族、宗教、交通、土地、矿产、环境、防务，投入极大的关注。每经一地，当地的户口、田亩、地形、地物等，作者都作了详细的记

【二】

· 辛卯侍行记 ·

载：西北少水，作者每到一地就记载当时的河流、湖泊、井泉，这些记载可以说具体而微，甚至连水质的甜咸也都记载下来。因为西北多荒漠，作者就十分注意当地的植被，“堡外白杨二十余株，碛中得此，不啻琅玕玉树矣”，“大漠不毛者十而七八，车中望见荒草，为之一释愁容也”（十二月初四日记）。西北多矿藏，作者详细记载了祁连山一带的金矿、甘肃玉门的石油、马鬃山的铅矿，以及新疆天山的铜矿、铁矿、煤矿等。完全可以说，西北沿途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无不出现在作者的笔下。这些记载犹如一幅幅“老照片”，如今看来，不仅使人倍感亲切，而且也是我们开发西北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记载交通道里，是《侍行记》的一个重要内容。《侍行记》本身就是一幅一万多里的交通路线图，而作者又以所经的交通要道为起点，记载了当时国内外其它有关的交通路线。陶氏之所以将重点放在记载交通道里上，是他看到交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。他针对当时甘肃庆阳一带运道不通、谷贱伤农的情况说：“运道不通，病民特甚，宇内类此者甚多，岂独庆阳然哉！”而我国旧史志往往忽视记载交通路线，所以陶氏在行记中，不但记载了沿途各省内县与县之间的交通路线，而且记载了沿途省与省之间的交通路线。在交通要冲之地，陶氏还用专门的篇幅来记载当时国内的交通干线，甚至国际间的交通路线。全书中专门记载交通路线的地方有二十处之多。如在“临清运河”下记载了京杭运河的路线和道里。在“洛阳歧路”中，逐程记载了由洛阳南达湖北汉口、东至山东济宁、东南经徐州到江苏淮阴的交通路线。在“保定北路及西路”中，记载了由保定经由北京、蒙古乌兰巴托、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到彼得堡的道路。再如“山西北路及西路”记载了由太原西北经戈壁到新疆奇台的路线。这些记载保存了清末及其以前的交通资料，对今天的研究工作有很高的价值。当时西北地区比之内地，交通状况自然是相当落

【三】

·前言·

后的。但是作者还是将重点放在了我国的西北几省，书中专门记载西北交通的地方有十二处之多。在“咸阳西南路”下记载了经由四川到西藏、云南以及到缅甸仰光的道路。“平番歧路”下记载了平番经青海到新疆、西藏道路。作者专门记载祁连山道的地方多达四处，记载了东西南北穿越祁连山的山道。正如作者所说，“汉以二关为西域门户，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障。宋以后沦入流沙。自今赴新疆，必取道哈密，不能迳达于阗”。为探求汉代道路的经由，作者利用新疆官员亲自探路所得资料，作“汉玉门阳关路”，逐程记载了西南到于阗（今新疆于田县）、和阗（今新疆和田县）的道路。这些记载中，不仅记载了每一地的地名和距离，还记叙了当地的地形地物。这些资料，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它史书，有的得自地方官员的汇报，有的是当地官员亲自探寻道路的记录，有的是“询之老兵，得诸蒙回及回鹘猎者”。这些史书不载，由作者调查得来的资料是十分珍贵的。在《侍行记》之后，凡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，无不重视《侍行记》的有关记载。

陶氏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，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人。这些品质，无论是百年以前，还是在百年后的今天，都是难能而可贵的。作者生活的清朝末年，内忧外患频仍，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。当时的有识之士，都在探索中国的出路，或革命而图存，或变法而自强。作为封疆大吏的公子，他完全可以“乘父兄之余荫，鹏搏霄路，骥骋天衢”，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。他才学出众，“倘令出其所学，驰鹜当途，唾手三旌，定堪操券”，同样也可以飞黄腾达。但是陶氏淡泊无欲，早年中举后就无心于科举和仕途。他安慰落第的考生说：“寒士生涯，半耕半读，无求于世，俯仰自如。”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科举制度的腐朽和官场的丑恶。他说“学问品行，本与科名无涉，而庠序中人，以科名概之。一若得有科名，虽荡检逾闲，漠不为耻。论其名天下多读书人，论其实天

【四】

· 辛卯侍行记 ·

下绝少读书人”，“科名愈滥，人才愈绌”。他揭露官场的腐败说：“以五百人之饷养四百人，弥补额外之费，择健卒倍其饷，不以自肥，即今之廉将也。他如补缺，引见一次，部吏撞骗需索，十年克扣，不足偿债。督抚提镇阅操一次，近者苦应酬，远者苦征调，三年克扣不足偿债。”他对官场腐败造成的恶果深为忧虑：“近人益竞浮嚣，亡农工商，皆无所能，率谋为官，官多则剥民，民贫则思乱，如之何，如之何？”在堕指裂肤的甘、新道上，他看到了戍边的士兵，于是痛斥假冒军功、窃取官爵者说：“遥想守塞士卒，荷戈冰天雪窟中，更当若何艰苦！而安坐无劳者，恒欲昌得边防保举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将那些贪官斥为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和不知廉耻之辈，而且要将他们来世“罚作塞外骡马”。可见他对官场的腐败是深恶痛绝的。他详细记述了光绪丁丑（1877年）关陇晋豫同时大旱，“哭声被野，饿殣相望”的惨状，指出了当时“官民俱穷，人心思乱”的深刻的社会危机。他尖锐地指出：“仕途之弊，以行同商贾也。”因此，他提出疗救社会弊病的药方，其一为“正人心”。他说：“天下事成败在人，人之成败在心，心术弗良，变法奚济？”“人心不端，虽有富强之术，百举百损。”药方之二为“澄吏源”，他说：“不澄吏之源，侈谈绥边驭远，耳之皆经济，审之梦呓耳。”陶氏提出的可谓是苦口的良药，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已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了。陶氏评论时政的言论，是《侍行记》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在这些言论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对国家、民族和人民的良心和责任，今天读来仍是十分感人的，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。

陶氏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。他对当时我国人口和环境问题也发表不少富有预见性的议论。当我们认为人多怕什么，在大批所谓“人口论”的时候，他早就人口问题发出了警告：“近日生齿日繁，人满地少，古所未耕者，今皆田之，故灾浸亦密于古。”他还说：“中古以降，户口益滋，耕及陵原，专恃雨泽。高山大麓，

【五】

·前言·

悉施锄犁。”人口的增长，造成了耕地的不足，迫使人们不得不与河争地，不得不“耕及陵原”，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而在陶氏频频示警后的几十年，我们却仍有围湖造田、与河争地、向荒山要粮。陶氏早已经指出：“古时河道深广，有余地以听水之涨落。山多林木，沙土不随水而下，故川流无阻。后世山皆垦辟，沙土浑流，易致浅窄。人烟稠密，与水争地，河患斯亟。”“与水争地”和“山皆垦辟”的严重后果是：“沙土疏颓，淤河决防，深林多赭，不能吸气致雨，不能庇雪缓融，水源易溢易涸。累此数病，故灾祲之生广及千里或数千里。”是陶氏通过实地考察，第一个提出了新疆“人满之患”的说法。据报载，今天新疆绿洲上的人口密度，已经与东南沿海地区不相上下了。也是陶氏第一个提出保护祁连山的森林的问题。这些都说明他的确有过人的见识。陶氏不仅提出了一些富有预见性的问题，还找出了一些今天看来仍然符合科学的解决办法。他针对陕西“河高于平地，恒忧泛滥”情况，提出“宜徙山农于渭北荒地，悉废山田，令草木繁衍，则沙不顺流而下”的治理方法。这不就是今天政府提出的种草种树、退耕还林吗？今年，我国的北方大旱无雨，河流干涸，人畜饮水困难；南方暴雨成灾，洪水泛滥，淹没农田和房屋；沙尘暴的出现，真是风沙弥漫，昏天黑地，令人窒息。它不仅祸害我国的北方和南方，而且殃及我们的邻国。这使举国上下痛感到环境问题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。完全可以说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前，我国的生态问题已经告急，而过去几十年，是我国环境发生最大变化的年代，换言之，就是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年代。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历史的经验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，也就不会在环境问题上面对这么多的难题了。
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在建设四化的今天，在开发大西北的时候，《侍行记》一书对我们还是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的。

通常的说法是《侍行记》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光绪丁酉（1897

【六】

· 辛卯侍行记 ·

年)养树山房刊印的六卷六册木刻本，另一种是沈云龙主编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三辑，出版地点和年代不详(以下简称文海本)。

这次校点，我们发现还有第三种本子，它也是光绪丁酉养树山房刊印的六卷六册木刻本。这两个光绪丁酉本的版式完全一样。但经过仔细比较，才发现：一个是光绪丁酉原刻本(以下简称原刻本)，一个是光绪丁酉原刻本的修订本(以下简称修订本)。修订本不仅改正了原刻本中的错讹的字句，而且对书中的内容做了删节或改写。如卷三内一处修订本就删去原刻本1885字，改写为638字。文海本又对修订本作了删节，少则几个字到几十个字，多则几百字到上千字，如在卷五内一处就删去2199字。必须指出的是，无论是修订本，还是文海本，对原刻本改动都没有涉及行记的主要内容，主要是作者对自己一些说法的修正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修订本是由作者亲自完成的。文海本的改定者究竟是谁？因为出版年代和地点不详，而且书中也没有作任何说明，因而还是一个疑问。我们认为可能是作者自己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在校注时就以修订本作底本，以原刻本和文海本作参校本。原书正文为大字，作者自注为双行小字。这次整理时仍按原文版式，双行小注前后加圆括号，以与原文相区别。原书的空格、提行，除表示尊君重亲者外，一律一仍其旧，不作改动，只对文中比较长的考证和记事文作了分段。涉及到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不当之处，均作了技术上的处理，修订本与原刻本和文海本文字上的异同，都在校注中一一作了注明。原书中的眉批，为了排印方便，都提行空四格置于书中，并在眉批前加“眉批”，以与正文相区别。

对于修订本中因避讳改写的字以及明显的错字，我们直接作了改正，不再在校注中说明，其余的都在校注中一一作了注明。将正确的字加上()，放在前面；将错误的字加上〔〕，放在后

面。

作者引用的古书很多，其中相当多的书名用习惯称法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简称《汉地志》，点校时一仍其旧；相当多的引文没有按古书的原文照录，而是加以删节或作了改动，因此在标点引文时一般不加引号。

本书的注释，只限于地名，主要注释正文中与当时国内主要交通路线有关的地名。至于原书双行小注中的地名，除与主要交通路线有关的外，其余地名摘要作注。书中涉及的国外地名，不在注释之例。

地名注释中，县及县以上地名的名称、驻地、隶属关系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00》(民政部编)为准。如书中的县与县以上的地名与今地名名称、驻地相同者，一律不作注释。原书还有三篇序言和跋文，今只将两篇序言校点后置于卷首。

整理本书期间，杭州大学陈桥驿先生、中国社科院刘宗弼先生均给以大力帮助，在此谨致谢意。由于水平的关系，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点校者

2001.10.

【八】

· 辛卯侍行记 ·

西北行记丛萃

丛书主编 胡大浚
策划统筹 韩惠言
封面设计 李树军
版式设计 徐晋林
刘铁巍
韩惠言

目
录

前言	(一)
序	王树楠 (一)
辛卯侍行记序	丁振铎 (三)
卷一	(一)
卷二	(七六)
卷三	(一五八)
卷四	(二三三)
卷五	(二九四)
卷六	(三六五)



卷一

自陕西东至河南道口镇^①，乘舟经山东德州^②，北至天津，二千八百六十八里

辛卯四月，家君奉召入觐。二十七日庚申，倣装，衣箱六，书箱九，雇轿二，轿夫每入日给钱三百。轿车四，每乘价银十六两。大车四，每乘价银二十四两。皆雇至河南道口镇。同行者高爽溪、表叔垲、怀宁张愚生绍元及其长子宽宗厚。又金匱施裕堂衍绪，以赴京兆试结伴。(家人沈和、张德、张祥、张虎、许庆，打杂人王四、尤和。)家君代两首县拟信，嘱东路寅友勿事供张。保廉作家信，托许公若丈由上海转寄。又致金匱伯工部信，托觅寓庐。

二十八日，巳刻，启程。四里长乐门^③，家君诣官厅，抚台鹿滋轩偕长笠农、德滋轩两副都统，藩台张竹晨，臬台唐斐泉，松鹤龄、江海帆两道台，行寄请圣安礼。(尚将军病，未来。)张仲轩、席星府、张次丞诸幕宾于道旁设茶座，邀往话别。三里东郭门。(郭外歧路：东南行十里尉家坡，又十里水沟，十里毛家河，十里蓝田境新街，二十里泄湖镇，二十里蓝田县。郭外东北行，十五里光泰门，又十五里新住镇，二十里呼于堡，渡渭水。西北十五里高陵县。)东北行。(郭外二里，道南为金花落村。又二里，

[--]

· 辛卯侍行记卷一 ·